

增订本

吴天墀

西夏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西夏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责任编辑：吴长显

封面设计：陈世五

西夏史稿（增订本） 吴天墀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3.75 插页9 字数318千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二版

1983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7,701—43,700册

书号：11118·38

定价：1.72元

序

徐 中 舒

西夏和辽、金、宋四个政权出现于我国中世纪的后期，它的存在历时190年（公元1038—1227年）。如果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夏国传》）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更历时347年（公元881—1227年），比同它先后相鼎立着的辽（公元916—1125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金（公元1115—1234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在时间上历年更为长久。我们即使把北宋和南宋立国时间拉通计算，也不过320年，仍比它少27年。在幅员方面，西夏境土之大，奄有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 and 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它长时期屹立在祖国大地上，是不容忽视的。乃元人纂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的专史，只在三《史》中各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116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纪》一卷，135卷的《金史》只有《西夏传》一卷，而在“正史”中最以卷帙浩繁著称的《宋史》，全书496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上、下两卷。元代史臣用以专述西夏史事的篇幅如此其少，当时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以未被纳入一部专史之故，从此遂致湮灭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清代嘉、道以来，崇尚考据之学；由经学转向史学之后，不少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于是掇拾烬余，补葺史阙，极其辛勤地撰写出西夏专史多种问世，重要的有：张鉴的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42卷，周春的《西夏书》15卷，陈崑的《西夏事略》16卷；最后，戴锡章在民国初年撰成《西夏纪》28卷。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逐渐有着明确具体的内容，而不再处于若存若亡、若明若昧、不足轻重的状态了。同时在另一方面，有关西夏的地下资料，却又日有发现；学者们通过这些地下资料，已能认识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并掌握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无疑又给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天墀同志多年从事宋史的钻研，在充分利用前人西夏史著述的基础上，结合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所得的西夏文物资料，披荆斩棘，写成这部《西夏史稿》，可以说是带有点开荒性的著作。它经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本书的写作要旨，作者已在本书《前言》中有所陈述。现在只把阅读本书后的一些感受，简单写出如下三点：

第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本书里特别受到重视。西夏在我们祖国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当时跟它相鼎立着的辽、金和宋，则分别以契丹、女真和汉族为主体民族，所有这些政权的民族成份都不是单一的。比如西夏除党项羌外，就还有吐蕃、回鹘、蒙古、契丹和相当多的汉族人民。辽、金、宋政权的民族成份也都同样是复杂的。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都是当代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都应该给与同等的历史地位。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为其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所局限，对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是完全认识不到的。以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人数最多的汉族的史家来说，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不免充斥着和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这种偏见对于贯彻民族平

等的原则就是一个大障碍，而且也是根本不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因为一部整体的中国史，是由祖国各民族的创造活动所共同组成的，各民族部分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彼此互相结合的过程，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济文化方面则始终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绝对难以分离。但以往一切旧史学家由于眼界狭隘，他们所最关心的只不过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而对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共同愿望，却往往漠视，很少作出适当的反映。所以要写作象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族史，应该把广大的各族人民和居于少数的统治阶级区别开来，要清除统治阶级所带有的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并把各族人民合作友好，互相依靠，共同生产劳动，创造祖国历史的热烈意愿和光辉业绩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历史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往往会遇到一些峡谷险径，凶滩恶水，必须迂回前进，才能达到光明胜境。从祖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反动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障碍，最后总是要被人民加以撤除的。举例来说，在祖国历史上的夏、辽、金、宋几个政权分立对峙竟达三百多年之久，何以接着又出现了元、明、清的大一统局面呢？这就是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结果。因为各族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战争，虽然经历着漫长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共同愿望还是得以实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给祖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作者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西夏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去，尽管西夏史料散亡太甚，而仅存的点滴又多带有封建主义的偏见和狭隘性，待克服的困难不少，本书的写成是向人民的西夏史跨出了一个大步，这显然也就是本书所取得的新成就之一。

第二，研究西夏历史的难点，在于足供采录的资料太少；现

在从事写作，就必须广搜博览，参伍排比，掌握可信史料，打好坚实基础。但从故纸堆中拾遗补阙，来源既多歧异，矛盾抵牾亦复不少，倘轻率下笔，难免以讹传讹，造成疑误，有违历史真实。此书在采择史料，利用前人的成说方面，对于史事的判定一般是很审慎的。例如《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一书，在“西夏史料”栏中所列的明人李维楨等撰《西夏始末记》、《西夏录》、《经略西夏始末记》、《平夏纪事》、《平夏疏录》、《安夏录》、《入夏录》等七种及清人马鸣銮撰《平夏纪录》一种，上述各书所谓“西夏”或“夏”，系指明玉珍在今四川东部所建夏国，或记今河套宁夏等地之当代边事；《图籍录》还列有《西夏经义》13种21卷，则系清人何西夏讲说儒家经义之书；又同书同栏列清人邵廷棻的《西夏纪事》12卷，作者据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对勘，邵氏所著有《东南纪事》及《西南纪事》各12卷，而无《西夏纪事》，则所谓《西夏纪事》者殆为《西南纪事》之误可知。以上这些本来与拓跋氏西夏完全无关的书，经作者加以考正指出显然是有必要的。

又如吴广成、戴锡章这两位专治西夏史的名家，前者在所撰《西夏书事》第35卷，后者在所撰《西夏纪》第24卷里，都将金熙宗皇统五年（即宋高宗绍兴14年）夏季遣使南宋的外交酬应，记作西夏向南宋入贡。经本书作者检对《大金国志》第11卷所载，便确证所记其年夏天的“夏”字，被吴、戴两氏误解成为西夏，这样西夏入贡南宋的记事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此外，如西夏统治者元昊之诛杀外戚重臣野利弟兄，本书采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第9和第11卷的记载，判定其事发生在夏宋议和后二年，而不肯附和现在有的同志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记年代为可信的意见——它是把野利弟兄之死说成发生在夏宋

和议达成之前的。作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乃是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7卷里关于此一“公案”原委的详确记载，并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在本书中还逐处可以见到一些事例，如西夏自称“白上国”的国名取义，西夏右厢军事要隘克夷门的地理位置等等，作者都认真进行考证，力求合乎实际。

第三，本书在编写方式上，照顾了普通阅览的需要，史料充实，引据可信，是一本适合学习的西夏史入门书籍；对有志进一步研究西夏史的读者，在寻找史料方面也提供了多量充分线索，把它作为前进的阶梯，可以避免或少走弯路。因为留存下来的西夏史的关键性资料非常缺乏，而在另一方面和它有着些少关系的资料，却又散见各书，极为零琐，加以拣择和使用，不能不给初学的人造成一定的困难。戴锡章的《西夏纪》一书，征引参考书目即达311种。现又历时半个多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物日益增多，中外出版界关于西夏的专著、论文、资料、图片、报导之类，也陆续有所发表；此书附录4《西夏史文献目录》所补充收录的，约计亦在320件以上，因此有关西夏史的著述资料，由于零散而不集中，显得数量又是繁多的。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勤搜资料，有见必录，在本书正文、附注和附录里，均有充分的介绍，这对读者进一步研习西夏史，必然是很有帮助的。

西夏史研究以往是一个薄弱环节。天墀同志现在写出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这就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热切盼望这门科研工作在天墀同志带动下，今后继续获得长足发展，在四化建设新长征的凯歌声中，不断夺取丰硕的成果！

前 言

西夏在祖国历史上，曾是先后与宋辽、宋金鼎立约近二百年之久的王朝，它的存在，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元人修史时，对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编纂成纪传体的所谓“正史”，而独于西夏，则仅据三国旧史草率编成分量无多的传记（《宋史》有《夏国传》，《金史》有《西夏传》，《辽史》则称《西夏外纪》）。脱脱等人既未能检出耶律楚材于蒙古灭夏时所收得的大宗文献^①，如实录、潜牒^②、档案、文书等类；也未能充分利用宋人有关西夏的著作，如孙翼的《夏国枢要》、刘温润的《夏国须知》，以及佚名史学家的《赵元昊西夏事实》、《西夏事宜》、《西夏杂志》、《契丹夏州事迹》^③等书，并其他零散纪录，撰成拥有足够篇幅的西夏专史。这种作法带来的不良后果，最严重的是使有关西夏的丰富史料，湮没得百不一存；其次，也使宋、辽、金、元诸史少了一部足供互相参稽的珍贵文献。这对于祖国历史的研究，实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无可弥补的损失。

清代乾隆、嘉庆以来，有不少的学者曾就前代文献作过拾遗补阙的功夫，想给散亡数百年的西夏历史进行部分的复原工作。如洪亮吉有《西夏国志》，周春、王昙、秦恩复三家各有《西夏书》，徐松有《西夏地理考》，无名氏有《西夏志略》，陈崑有《西夏事略》的撰作^④都是。不过这些著作，有的没有完成，有的

没有刊布，到现在连存亡也不清楚。因此它们对于学术界可说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小影响。在少数完成并已刊布的西夏史著作中，以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和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一向成为我们学习西夏历史必要的书籍。

但所有这些关于西夏历史的著作，因受时代的局限，不免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它们采取的是封建主义的传统史学的观点、方法和体例，并用文言文写成，考据上也不免有疏略抵牾的地方。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都已难于适合今天一般读者学习上的需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里面，为了更好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继承祖国各民族的历史遗产，对于文献散佚，一度长期被人忽视而近年受到中外学者注意的西夏历史，实有加以大力研究的必要，因此作者才鼓起勇气把多年前编写的《西夏史稿》重新修改出版。但限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在编写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难，而最感棘手的是西夏史料散亡得百不一存，其幸存的东鳞西爪般的史料，又差不多都是附丽于两宋统治阶级的学者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支配下，采取歪曲的形式反复折射出来的西夏统治阶级的历史活动，这就影响到本书，使得它暂时只可能是大汉族主义观点未尽涤除的西夏统治阶级的活动史，它与作者预想中的一部真正西夏人民的历史是大有距离的。其次，前人关于西夏历史的未刊稿本和散藏国内外的原始文献，以及近人在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地下资料^⑥，除少数曾由学术界前辈称引、翻译、介绍的部分外，前两次属稿时囿于闻见，无法加以利用。这次再度修改，参考了文物考古的新资料，补入地下新材料不少，但终究不能说主要困难已被克服，所以这

部史稿显然只不过是西夏史撰作上的一个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本书的编写，主要在给高等学校学生作课外读物，给中等学校教师作教学参考用书。在史料搜集的方面，也可供有志钻研西夏历史的读者作前进的桥梁。

在本书的编制问题上，我要向读者说明如下几点：

一、西夏史料主要散见于各种旧籍。本书在陈述史实，特别是征引旧籍时，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以便读者进行核对，纠正错误。

二、对于不便叙入正文的补充性资料和考证性文字，悉依重要程度，适当载入附注。

三、本书在行文中摘录旧籍的文字，一般是浅显易懂的。摘录的用意，在于避免不必要的多一度转述而更能直捷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其次，也让读者适当接触我国古典历史著作，以便于对中国历史（自然西夏历史也包括在内）作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必得申谢的一点是，本书虽属稿本性的东西，但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却颇为不少。它的初稿写成于一九五五年，当时系在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先生的鼓励和支援下进行编写的。一九六三年又作了一次修改，初稿及修正稿俱承徐中舒先生于百忙中惠予校阅，并作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指示；在编写和两次修订过程中，胡瑞祥同志对本书各稿在体例与文字的表现形式上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还协助了部分工作。嗣后本书稿本一直搁置达十五年之久，现在才有机会再度修改出版与读者见面；出版前，又承徐中舒先生作最后一次校阅指导，并拨冗撰写序文，实为本书增色不少。又本书原只是一种业余写作，在两次进行修订中，除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种种协助外，四川大学历史系领导上也对作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没有以上各方面的热情支援，本

书的完成和出版是不大可能的。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诚恳地请求读者不吝指教批评，以便本书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能够得到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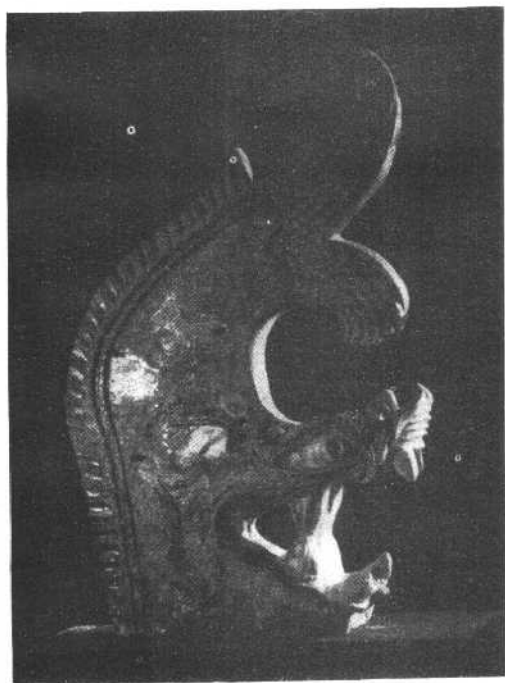
吴天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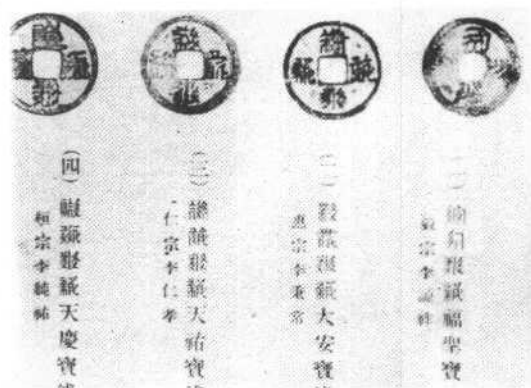
- ① 见《元史·耶律楚材传》。
- ② 《宋史·夏国传》记西夏于“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金等为学士，俾修《实录》。”《金史·西夏传赞》有“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的话；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二，谓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证明西夏是有实录、谱牒一类著述的。
- ③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载有《赵元昊西夏事实》及《西夏事宜》二书；《西夏杂志》见尤表《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志”或作“记”。又《契丹夏州事迹》一卷，见郑樵《通志·艺文略四》著录，夏州即西夏。
- ④ 上举各书，请参阅本书附录四：《西夏史文献目录》。
- ⑤ 明姚士粦《见只编》曾记：“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此“夏国书”从其能为夏亡三、四百年后一普通汉族人士得以看懂的情形推断，它可能是用汉文编撰的西夏史著作。又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李氏所藏西夏实录之为原本或译本，均有可能。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写的序里说：“犹忆光绪辛巳（公元一八八一年），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从姚士粦、钱谦益以及柯劭忞留下的三条记载及清末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看来，有关西夏的历史文献，今后还可能继续有所新获。

图一 西夏瓷器：
玉春瓶、高足碗、
双耳罐
(《民族画报》供稿)



图二 琉璃鸱吻 西夏八号
陵出土,高一百五十二公分,
宽五十八公分。从这一巨大
的鸱吻可以看出西夏建筑
的高大宏观

(《民族画报》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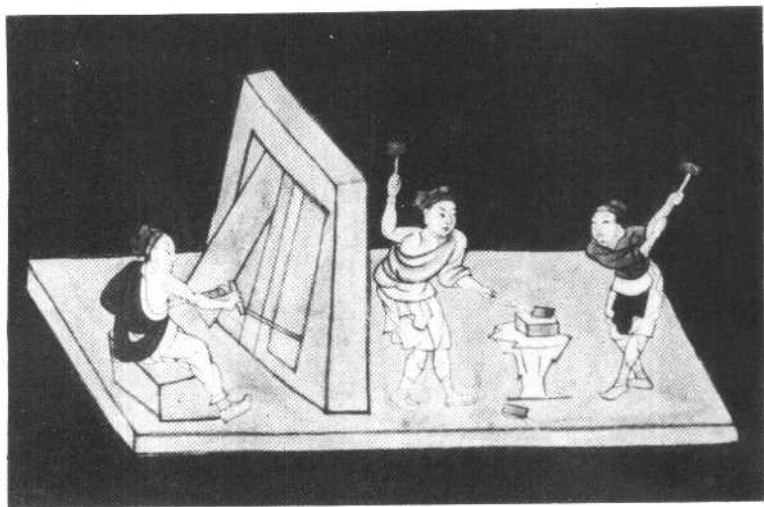
图三 西夏钱币



图四 哈拉浩特（黑城）出土的西夏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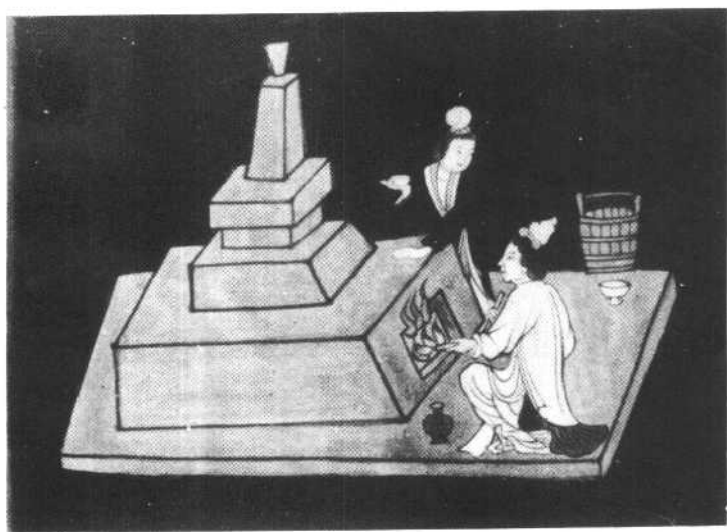


图五 安西榆林窟西夏供养人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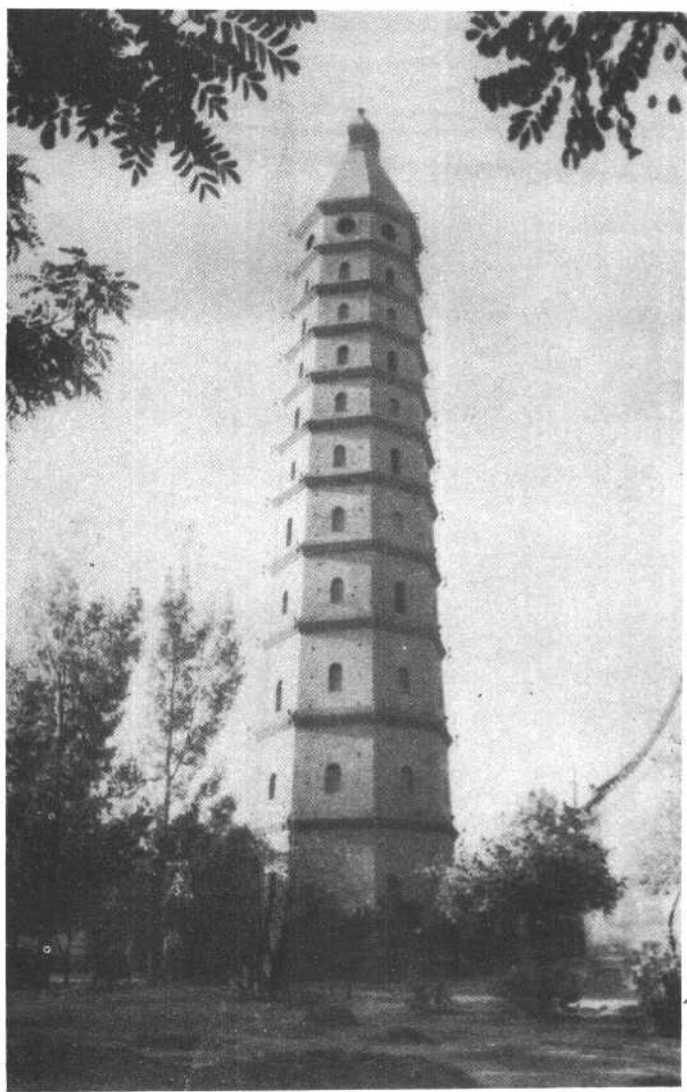
图六 安西榆林窟第四窟的西夏壁画：打铁图

（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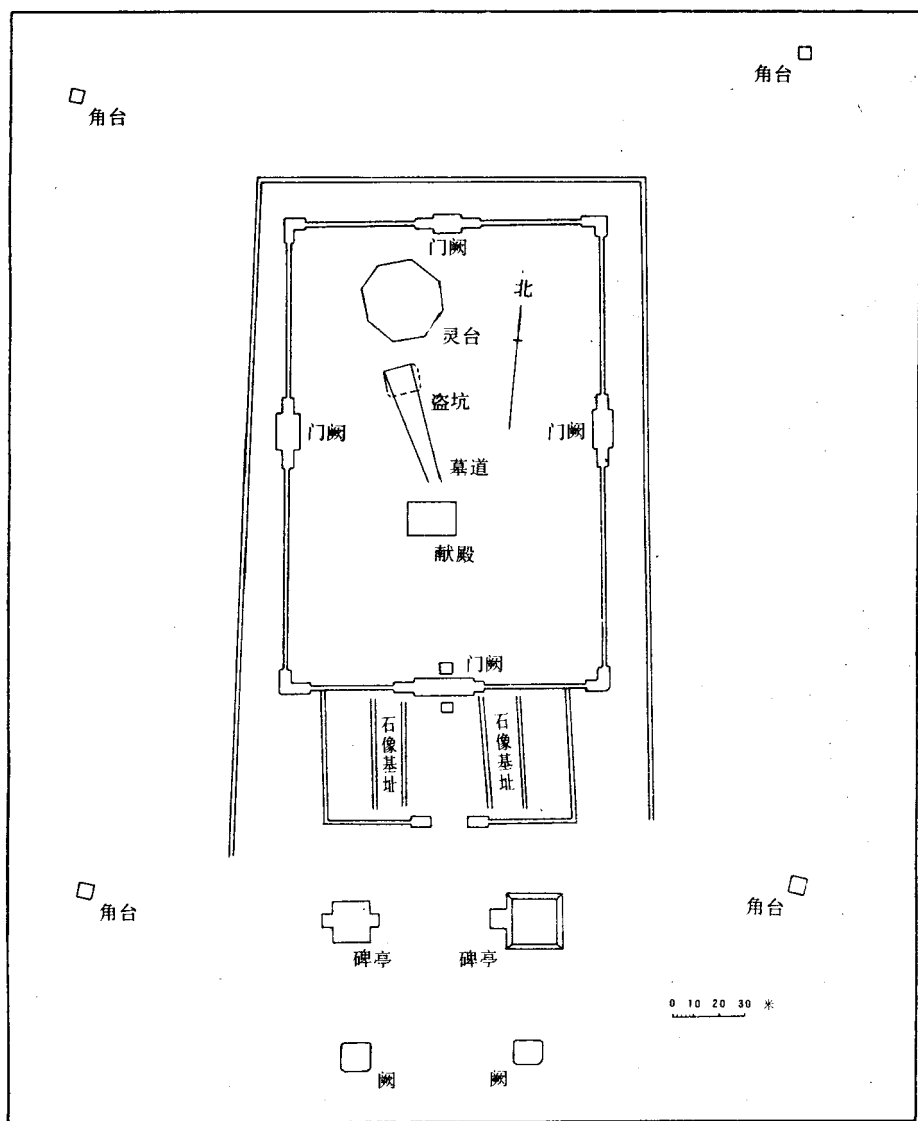


图七 安西榆林窟第四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

（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



图八 夏毅宗谅祚(1049—1066)时建造的银川承天寺塔
(宁夏博物馆供稿)



图九 西夏八号陵平面布局图